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67期（民國99年3月），59-9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欽差」使命：沈宗濂在西藏(1943-1946)*

張瑞德**

摘要

1943年10月，沈宗濂取代孔慶宗成為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此項人事異動的消息公布後，引起了各界的矚目，其特殊之處，在於沈宗濂原係蔣介石的秘書，出任此職係由蔣介石直接指派，而非如慣例上由蒙藏委員會所任命。沈宗濂駐藏時期，西藏各界對國民政府的態度均有好轉，其原因固然是由於抗戰勝利，中國躍於強國之林，藏人目睹印人反英浪潮澎湃，對於英人在印勢力是否能持久產生疑慮，而沈宗濂在藏期間表現優異，也是原因之一。沈宗濂及其工作團隊，一反前任處長孔慶宗的官僚心態和大漢沙文主義，對於西藏問題抱持著承認現狀的務實態度，加上他們的身段柔軟，因此能夠迅速獲得藏人的好感。更重要的是，由於沈宗濂出身侍從室，能夠獲得蔣的充分信任與支持，以致於他所掌握的駐藏辦公室，不論是編制、人員或經費，均較前任處長孔慶宗時期充裕，並且用人自主，遇有問題尚可直接致電侍從室，而不需要層層請示。雖然如此，沈終其任內，在西藏問題上仍無法有所突破，推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項：（一）國府的邊政未上軌道，對藏情認識不足；（二）西藏堅守自主原則，對中、英採取「不即不離」的等距關係；（三）中、英雙方均堅守其國家利益，不肯讓步。

關鍵詞：沈宗濂、西藏、蔣介石、孔慶宗、蒙藏委員會

---

* 本文初稿曾蒙林冠群教授與三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謹此致謝，惟文責仍應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2009年10月16日，通過刊登日期：2010年2月3日。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前　言

1943 年 10 月，國民政府發表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沈宗濂(1898-1978)為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任命公布後，蔣介石(1887-1975)即召見沈作了一次長談。在談話中，蔣特別強調沈此次去藏，使命重大，要求沈在不引起英印當局疑慮的前提下，完成以下各項任務：

第一，宣揚中央的實力和統一中國的決心。中、美、英、蘇已結成同盟，抗戰必勝，中國成為世界四強之一。可在此基礎上，向西藏當局說明蔣統一全國的堅定意志與信心。

第二，強調中央對藏民一貫的友善與尊重態度。應向藏人說明英國正受印度獨立運動的困擾，今後必然再無力援助西藏，西藏只有加強同內地的聯繫，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第三，要求西藏當局同意履行前經由中央政府派員勘查康藏公路的修築路線。一旦戰爭結束，即行動工修築，以便迅速打開內地和西藏之間交通隔絕的局面。

第四，盡力為藏胞謀福利。計劃在拉薩設立電報局、銀行、醫院等機構，增加或充實拉薩原有小學的數量和規模。

此外，蔣介石允諾撥發第一筆臨時費印幣 48 萬盾，作為沈宗濂此行的活動經費。沈在行前可編列預算計畫，並列入藏所需要各項開支，包括禮金、禮物等。沈並可直接遴選辦事處大、小職員，由蒙藏委員會任用，也可調回他認為不適任的在藏人員。凡遇重要機密事宜，沈可直接致電蔣請示，不必再經過蒙藏委員會，為此侍從室機要組還專門發給沈密碼，供其使用。[1]

沈宗濂出使西藏的規格，儼然是位特派大員，可以看出此次任命的非比尋常。根據重慶政壇人士的觀察，沈的出使西藏，名義上之所以仍然沿用過去駐

[1] 〈軍委會為面示沈宗濂入藏工作方針及照准所擬工作計畫並撥經費等事致蒙藏委員會代電（1943 年 12 月 29 日）〉，收入張羽新、張雙志編，《民國藏事史料彙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以下簡稱《史料彙編》），冊 1，頁 213；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 142。

藏辦事處處長的頭銜，主要是擔心如果使用特派員的稱謂，恐會引起英印當局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疑慮，才以處長新舊交替形式出現。[2]西藏攝政達札在接到蒙藏委員會此一人事異動的通知後，在拍給該會委員長吳忠信的覆電中，則表示沈「資深望重，素爲蔣委員長所倚畀，該員到藏，中、藏必能照舊恢復感情如意，深慰欣謝。因中、藏和好起見，藏境迎護藏兵等，業經派往，並飭沿途營官，所有烏拉（差役）及一切隆重支應，不得臨時周章，已由噶廈（行政部）飭辦之。」[3]當時英國駐拉薩官員的觀察也指出，蔣希望藉著任命其親信沈宗濂入藏，修補與拉薩之間的關係。[4]

有關沈宗濂駐藏期間的表現，晚近學界中外文的相關著作中，大多僅略微提及，[5]尚乏專門性的研究。本文根據蒙藏委員會及相關機構檔案，與回憶錄性質文字，對沈宗濂任命、上任經過，及其任內表現進行全面的研究，盼能經由此一個案明瞭近代西藏問題，甚至整個邊政問題的關鍵所在，並檢討蔣介石以「特使」方式解決問題的利弊得失。

2 陳錫璋，〈西藏從政紀略〉，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第 79 輯，頁 116-117；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頁 142。

3 〈達札攝政歡迎沈宗濂駐藏致蒙藏委員會電（1943 年藏曆 9 月 21 日）〉，收入《史料彙編》，冊 7，頁 188。

4 British Mission in Lhasa to the Political Office in Sikkim, 26 November 1944, in IOR, L/P&S/12/4218, cited in Hsiao-ting Lin,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Vancouver: UBC Press, 2006), p. 148.

5 代表性的專書包括：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and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Hertfordshire: Roxford Books, 1989), pp. 328-336, 493-497；周偉洲編，《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頁 553-560；呂昭義，《英帝國與中國西南邊疆(1911-1947)》（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頁 465-467；陳謙平，《抗戰前後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頁 185-193；黎裕權，〈駐藏辦事處的設置、功能與影響——兼論國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22-25、114-115；鄧銳齡等著，多杰才旦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頁 1207-1222；喜饒尼瑪、蘇發祥，《蒙藏委員會檔案中的西藏事務》（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頁 42-43；Hsiao-ting Lin,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 Frontier*, pp. 148-151；張永攀，《英帝國與中國西藏(1937-194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頁 138-156；郭卿友，《民國藏事通鑑》（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頁 205-206。

一

蔣介石之所以會有如此令人矚目的人事異動，並非無的放矢，而是有著以下的歷史背景：

一、西藏政局的變動。1941 年元月，親漢的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辭職，改由親英的達札呼圖克圖掌權，阻撓中印公路（康藏線）的修築，設置外交局迫使駐藏辦事處與其往來，甚至停運所有從印度經西藏運往中國西南的物資，使得漢藏關係陷入僵局。[6]

二、國際形勢的變化。二次大戰期間，部份印度在野的國大黨(the Congress Party)人士與日本暗通款曲，而日軍在東南亞勢如破竹的攻勢，恐對尼泊爾、不丹(Bhutan)、錫金(Sikkim)和西藏造成骨牌效應，並使中國西南省份的安全受到威脅。如此種種均促使蔣介石夫婦於 1942 年訪問印度，試圖說服當時與英印政府水火不容的國大黨領袖，如甘地(Mahatma Gandhi)和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等，不為日本所分化利用，並參加同盟國陣營。[7]蔣在訪印歸國後，覺得英國在亞洲應付印度獨立運動，尚無暇顧及、更無力干涉西藏事務，乃就援印之便，趁機修築康藏公路，便利調遣軍隊，運輸物資，對外可以援助盟邦，對內可以拉回西藏，同時也可以安定抗戰後方。

三、駐藏辦事處原任處長孔慶宗(1896-1981)的表現不佳。孔早年任職外交界，曾於駐比利時期間至布魯塞爾大學進修，獲博士學位，[8]返國後任中央大學教授，後入蒙藏委員會任職，曾任參事。[9]孔自 1940 年 3 月抵拉薩後，即以中央大員自居，一心想要恢復過去清朝駐藏大臣的各種權力，其傲慢態度與大

6 孫子和，〈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與中央之關係(1934-1947)〉，收入氏著，《西藏研究論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89），頁 188-193；張永攀，《英帝國與中國西藏(1937-1947)》，頁 191-204。

7 林孝庭，〈二戰時期中英關係再探討：以南亞問題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頁 39。

8 Tung-li Yuan,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2 (I)," *Chinese Culture* (Taipei) 5:3 (March 1964), p. 149.

9 劉國銘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頁 300。

漢沙文主義引起西藏地方官員的反感。[10]不過由於當時西藏的攝政熱振與中央關係良好，辦事處推動各項工作尚稱順利。至達札掌權後，改採親英路線，孔對達札的不友善措施，如 1941 年 9 月拒築中印公路、1942 年 7 月設置外交局、1943 年 4 月關閉馱運路線，一概主張由國府派兵入藏，以武力制裁方式解決。此種強硬態度，不僅與國府對藏以政治爲主、軍事爲輔的政策相違，同時也引起西藏當局的反感，導致辦事處所推動的各項工作受阻。[11]

四、1942 年 9 月的藏警糾紛案。事件的起因爲一漢人因口角打傷一居住於西藏的尼泊爾人，與當地警方發生糾紛。漢人逃往駐藏辦事處，辦事處警察竟將尾隨而至追捕漢人的當地警察扣留，經地方政府交涉請其釋放不允，歷時五個月仍未能解決。西藏當局遂致電劉文輝，稱藏方並無反對中央之舉，因孔矇蔽中央，破壞中藏感情，致起糾紛，請速召回，此後一切直接由藏方駐渝代表與中央交涉。[12]西藏當局最後甚至停止供應辦事處的日用物資，以示抗議。蒙藏委員會聞訊後，先是假定整起事件爲西藏當局所主導的政治陰謀，目的在測試國府對於藏獨運動的底線，因此堅持不應讓步，如對藏方屈服，將孔撤換召回，難保新任處長不會遭同一命運。[13]不過蔣否決此項提議，決定對藏妥協，蒙藏會乃呈請將孔慶宗調回，另請以侍從室第三處主任秘書羅時實充任駐藏處處長，但蔣批示暫緩。此時，軍令部接獲各方情報顯示，辦事處有帳目不清、人事紛爭等弊端，軍令部長徐永昌乃建議蔣介石派員入藏，以查辦藏警糾紛案爲名，即以之充駐藏辦事處處長，稍後再伺機將孔調回，以不失中央威信。[14]

---

10 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歷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頁 232；Hsiao-ting Lin,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p. 148。

11 黎裕權，〈駐藏辦事處的設置、功能與影響——兼論國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113-114。

12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 1943 年 3 月 4 日致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函，收入〈軍令部長徐永昌彙摘各方面情報並抒調整蒙藏會駐藏辦事處意見〉，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592/4410.01-15。

13 Hsiao-ting Lin,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p. 148.

14 軍令部部長徐永昌 1943 年 2 月 22 日呈蔣介石文，收入〈軍令部長徐永昌彙摘各方面情報並抒調整蒙藏會駐藏辦事處意見〉，檔號：0592/4410.01-05。孔慶宗為四川人，任命的辦事處職員

蔣介石最後不用蒙藏委員會提名的羅時實，應是受到外交系統的影響。1943 年 3 月初，駐英大使顧維鈞在一次與蔣會談時，曾建議改派一位資深且望重的外交官駐藏，如此對英國與西藏均有好處。蔣連聲表示贊同，並說他一直在物色稱職的人選。[15]此時蔣對於接任人選，雖尚未確定於外交圈內尋找，但是已決定不用軍人。3 月下旬，侍從室第一處對駐藏人員一事簽報蔣稱：中央派駐大員甚有必要，惟以軍事大員為宜。一處主任林蔚加註：「賀市長（指重慶市長賀耀組）似頗相宜。」蔣則批示「似以方覺慧為宜，軍事大員不可派。」[16]不過蔣隨即又改變主意，接受黨國元老戴季陶所推薦的沈宗濂。[17]8 月，外交部轉陳侍從室、蒙藏委員會等單位一件該部駐加爾各答總領事報告，其中也建議派駐西藏人選，「應不但能應付藏方，且應能應付英方者」。[18]

蔣最後起用沈宗濂，顯然與其具備外交部的經歷有關。沈宗濂早年畢業於清華學校，曾留學美國。獲哈佛大學經濟碩士，為人精明幹練，富有謀略，曾在郭泰祺外交部長任內擔任總務司長。[19]1941 年末，郭因官風不正遭蔣介石免

多為川人，形成「川幫」，而吳忠信為安徽人，帶一批「徽幫」至西藏。兩幫人馬互不相讓，造成辦事處內部的分裂。參閱邢肅芝口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歷史》，頁 232。英方駐拉薩人員的報告，也指出孔慶宗與國府其他駐藏人員不合的事實。參閱 Hsiao-ting Lin,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p. 242。

15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1987），冊 5，頁 232。有關顧維鈞對西藏問題的看法，可參閱 Stephen G. Craft, *V.K.Wellington Koo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2004), pp. 156, 163.

16 唐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8），頁 310；方覺慧(1886-1958)，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曾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副主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訓練部部長、中央黨政委員會黨務組組長、中央黨政考核委員會陝豫區考核團團長等職，為 CC 系成員。參閱劉國銘，《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頁 95；濱田峰太郎，《現代支那の政治機構とその構成分子》（東京：學藝社，1936），頁 139。

17 邢肅芝口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歷史》，頁 233；戴季陶為九世班禪的佛門弟子，1936 年班禪在南京主持一場法會，戴以考試院長的身分，公開對班禪頂禮膜拜，頗不理會社會議論，且以此包攬邊事。當時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與戴為陳其美時代的革命夥伴，由於係初上任，凡事常請教戴，故當時有人戲稱戴為蒙藏委員會的「太上委員長」，吳也不以為忤。參閱金紹先，〈憶述國民黨元老吳忠信〉，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軍政人物編》（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卷 9，頁 939。

18 〈外交部致經濟部電（1943 年 8 月 12 日）〉，收入《史料彙編》，冊 7，頁 190。

19 一位外交人士指出，當時外交部總務司長的職位，甚至超越次長。全部各司，除了地域司之外，幾乎全為總務司職掌。參閱周旋華，《財政與外交的工作回憶》（台北：作者印行，2006），

職，外交部長一度由蔣介石親自兼任，但實際上政務卻由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主持。陳爲了掌握外交部的實際狀況，簽准由侍從室的祕書中，抽調李惟果任總務司長、邵毓麟任情報司長，沈宗濂則調入侍從室第四組爲秘書。[20]沈進入侍從室後，潛心研究各類問題，並經常提出建言。一次建議蔣利用時機加強與西藏的關係，曾獲蔣欣賞。此外，沈宗濂於外交部任職時，曾隨同戴季陶出訪緬甸與印度，對印度情況相當熟悉。戴曾在蔣面前稱讚沈宗濂思慮周密，有膽有識，給蔣留下了良好的印象。[21]因此沈最後能夠出線，應是蔣親自所做決定。

1943 年 10 月 18 日，蒙藏委員會吳忠信將駐藏辦事處的人事異動通知西藏攝政達札，獲達札覆電表示歡迎。

二

沈宗濂於接受任命後，即開始組織赴藏工作的團隊。他調外交部總務司的會計主任陳錫璋擔任主任秘書兼第一科科長（掌理總務、文書、人事等），[22]以雲南大學社會系教授李有義擔任第二科科長（掌理政治、宗教、教育、建設等），又增設第三科，職司宣傳、調查事項，由孔慶宗任內舊人左仁極留任，另留任藏人秘書李國霖，調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具藏文專長的康剛民任顧問，負責編輯藏文日報，調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一位技士任專員，負責調查西藏的地質礦產。又自重慶聘請兩位醫生，負責醫療所看診業務（見表一）。

此外，沈宗濂還邀請二位川康公路管理局的工程師，以專員名義赴藏，策

頁 65-66。

20 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頁 139；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未刊稿，國史館藏，1942 年 12 月 13 日。

21 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頁 140-141。

22 陳錫璋與沈宗濂結識經過，可參閱陳錫璋，〈西藏從政紀略〉，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 79 輯，頁 117；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頁 142-143；黎裕權，〈駐藏辦事處的設置、功能與影響——兼論國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25。

劃勘測康藏公路的修築計畫，另有一名專員則係由中央信託局委派，擬赴拉薩調查設立金融機構的可行性。[23]最後，沈宗濂又物色了一批必要的隨員，分別從事英文秘書、庶務、譯電、謄寫等工作，加上廚師、僕役等，共二十餘人。上述人員均依照外交人員出國辦法，可以攜帶妻小赴任，薪資較一般公務人員優厚，且以外幣支付，得以不受內地法幣貶值的影響。[24]

表一　駐藏辦事處新任職員名單

職別	姓名	年齡	學歷	經歷	備考
處長	沈宗濂	46	美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	外交部司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參事	
主任秘書	陳錫璋	54	北平譯學館畢業	駐巴達維亞副領事；外交部會計主任	
秘書	李國霖				
秘書	黃師華	39	東北陸軍講武學堂第五期，陸軍大學第八期畢業	軍令部高級參謀兼邊務研究所副主任	
秘書	丁武始	39	上海滬江大學文學士	中國航空公司駐香港專員及駐緬甸代表	
秘書	柳陞祺	35	上海光華大學文學士	光華大學英文系副教授；財政部鹽務稽核所英文秘書	
第一科科長	陳錫璋兼				
第二科科長	李有義	32	燕京大學法學士、文學碩士	燕京大學法學院研究助理；雲南大學社會系講師、教授兼研究室幹事	
第三科科長	左仁極				
科員	劉甲華	25	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畢業		

23　陳錫璋，〈西藏從政紀略〉，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 79 輯，頁 120-121。

24　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頁 142-143；周旋華，《財政與外交的工作回憶》，頁 69。

顧問	康剛民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科員	
辦事員	周志強	26	華英中學高中部肄業，無線電夜校畢業	軍政部第一軍用電台事務員	
專員	劉毓珙	55	北平譯學館畢業	外交部科長兼海參崴、伯力等處副領事	
專員	廖魯薌	43	上海中國國語專科學校畢業	國防部最高委員會速記專員	
專員	余敬德	34	倫敦工學院土木工程系畢業 印度工專電機系及無線電系畢業	曾於印度任營造工程師六年	旅印華僑係戴傳賢介紹
專員	李　銘	35	利　大學　科學士		
專員	曾	31	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技士	
醫療所主任	成之	43	法國波道大學醫學博士	上海清心醫院　電院院長；　十字會醫院醫師	
醫師	嚴家	29	西北醫學院畢業	重慶市民醫院住院醫師	
專員	李唐	41	美　魯大學碩士	南開大學教授；中央銀行及中央信託局　理	以上各員不在辦事處支薪
專員	李			蒙藏委員會專員	
專員	吳善多			川康公路管理局副總工程師	
專員	劉			川康公路管理局正工程師	
專員	張瑞之	49		和企業公司總經理	

資料來源：〈沈宗濂呈吳忠信陳報該處新任職員（1944年1月）〉，收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台北：蒙藏委員會，2007；以下簡稱《檔案選編》），冊4，頁499-501；〈沈宗濂呈吳忠信該處新任職員名單重新開列請鑒核（1944年4月27日）〉，收入《檔案選編》，冊4，頁536-538；陳錫璋，〈西藏從政紀略〉，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79輯，頁118-120；劉國銘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如果將沈宗濂的工作團隊和前任處長孔慶宗作一比較，可以發現前者的編制擴大（增設第三科及醫療所），員額也有所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改變，均與辦事處原有組織章程的規定不符，而係先由沈便宜行事，再由蒙藏委員會

修改章程予以追認。[25]更有進者，根據 1944 年修訂通過的辦事處章程，辦事處處長「綜理全辦事處，並監督、指揮所屬職員及中央駐藏各機關」，職權較孔慶宗時代大爲擴大，[26]凡此種種，均顯示沈能獲得最高當局的充分支持。

準備禮物也是行前的一件大事，因爲需要送的對象眾多，不但達賴、攝政、活佛、噶倫等西藏高層僧侶和官吏均需顧及，即便是達賴的生身父母，身邊的經師、侍讀，也不能遺漏。因此，沈宗濂派遣多人至成都等地，購買了一百多份的綾羅綢緞、金銀珠玉等，又專門至福建、江西採購一些漆器與瓷器。[27]後來到了加爾各答，沈又以美金在當地購買了許多歐美製造的電動玩具火車和小型電影放映機等，作爲覲見尚未成年之達賴的禮物。[28]沈曾在侍從室同仁爲他餞行的餐會上坦率說道：「我此行花錢如流水，不是不懂得節約，只是同落後又專制封閉的西藏政教上層人物打交道，不但要施之以威，還要誘之以利，在器量和魄力上都壓過他們，否則是會被他們小看的。」[29]

沈宗濂一行決定分兩批由重慶搭機至印度，採辦物資，兼作短期訪問，再經錫金入藏。因此備妥了護照，向英國駐華大使館申請簽證。沈宗濂和他的第一批隨行人員迅速取得了簽證，不過當英印政府和英國駐拉薩人員得知沈宗濂赴拉薩就職，恐將不利於英藏關係，遂通知英國駐華使館不要發給沈的第二批隨行人員簽證，英印政府又要求西藏當局限制沈隨行官員的人數。[30]

---

25 〈蒙藏會電沈宗濂行政院修正通過該處組織規程（1944 年 3 月 24 日）〉，收入《檔案選編》，冊 3，頁 17-21。

26 〈蒙藏會令駐藏辦事處抄發修正組織規程（1941 年 9 月 18 日）〉，收入《檔案選編》，冊 3，頁 11-15。

27 禮物共分爲三等：(1)甲等：贈送西藏最高級人員達賴、攝政、噶倫、錫金國王等禮物共 8 份，爲金錶、細毛皮袍、湘繡、玉器之類，每份約需國幣 50,000 元，共計 400,000 元。(2)乙等：贈送較高級人員禮物 40 份，爲繡貨、川綢、掛錶、茶晶眼鏡之類，每份約需國幣 20,000 元，共計 800,000 元。(3)丙等：贈送次高級人員禮物 60 份，爲衣料、茶葉之類，每份約需國幣 5,000 元，共計 300,000 元。以上共計 108 份，共需 1,500,000 元。參閱〈沈宗濂呈吳忠信擬分地購買緞綢等貨品以省運費請准以國幣六十萬元結購印幣以九十萬撥給國幣俾便應用（1944 年 2 月）〉，收入《檔案選編》，冊 13，頁 371-374。

28 有趣的是，英國駐拉薩官員送達賴的禮物則包括小孩騎的小腳踏車、圖畫書和自行車。參閱 Alex McKay, *Tibet and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 (London: Curzon Press, 1997), p. 157.

29 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頁 143。

30 Melvyn C. Goldstie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三

1944 年 4 月中旬，沈宗濂一行由重慶飛抵加爾各答，轉道拉薩就任。[31]在加爾各答停留期間，沈宗濂曾應印度政府之邀，於 5 月 6 日至 14 日前往德里訪問。期間除一般應酬活動外，曾與其外交部長(Indian Foreign Secretary)卡羅爵士(Sir Olaf Caroe)晤談 5 次。卡羅向沈表示，英國政策在維持帝國現有的疆土，對西藏並無領土野心，經濟關係也淺，但是由於西藏爲印度屏障，英盼能維持其自主地位，成爲強國之間的緩衝區。卡羅又說，在西藏人的觀念中，西藏爲一獨立的國家，事實上三十年來也的確是如此；而在中國人看來，西藏爲中國的一部份。此兩種觀念差距過大，不易融合。至於英國人的態度，一方面不願令藏人感覺不快，一方面也一直承認中國的「宗主權」(suzerainty)，此實爲一種折衷的辦法。[32]沈宗濂則強調中國對西藏行使的是領土主權而非宗主權，雙方在宗主權和領土主權的見解上出現了歧異。卡羅於是請沈一起查閱《大英百科全書》，查到宗主權的定義時，發現該詞有很大的伸縮性，看不出與主權有何明顯的區別；最後卡羅說：「依我的理解，當一個國家強大時，宗主權可以就是主權的同義詞，並無區別；但是如果國家當實力不逮時，則此主權自另當別論。」[33]

卡羅對於「宗主權」的解釋，引發了沈宗濂樂觀的聯想，他在寫回國內的報告中指出，「由卡氏對『宗主權』之解釋，可知中藏關係端在吾人之努力，如吾人實力上能加強對西藏之統治，英方似亦難作有力的阻撓，至相當時機，根據『宗主權』，中央將藏地外交權完全收回，似亦非不可能。」[34]此種樂觀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524.

31 《中央日報》（重慶），1944 年 4 月 16 日。

32 〈沈宗濂與印度外交部長卡羅談話記錄（1944 年 5 月）〉，收入《史料彙編》，冊 7，頁 231-232。

33 陳錫璋，〈西藏從政紀略〉，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 79 輯，頁 119；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頁 144：柳陞祺，〈我進藏的第一課〉，收入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第 4 輯，頁 73。

34 〈沈宗濂與印度外交部長卡羅談話記錄（1944 年 5 月）〉，收入《史料彙編》，冊 7，頁 232。

的信念，日後也成爲他推動藏務工作的動力。英方資料則顯示，卡羅對沈宗濂的印象頗佳，稱他爲「一個和藹並極爲明理的人」("a pleasant and eminently reasonable individual")。[35]

7 月 1 日，沈宗濂應英印政府駐錫金行政專員古德爵士(Sir Basil Gould)之邀，前往錫金首都崗多(Gartok)訪問 3 天，並獲錫金君主招宴。在崗多期間，曾與古德作私人談話數次。古德認爲解決西藏問題，1914 年的《西姆拉協定》(Simla Convention)已有良好的基礎；沈則指出所謂的《西姆拉協定》，中國政府並未批准，自然不能作爲談判的基礎。古德認爲討論西藏問題，應有西藏代表參加，如無西藏代表參加，藏方必然不能同意，1907 年中英俄會議的失敗，即爲一例；沈宗濂則表示中國爲西藏的宗主國，當然可以代表西藏。古德希望西藏問題能在印度政潮再度爆發前，得以解決；沈則以此係私人談話，不便逸出範圍爲由，未與其繼續討論。[36]

英方資料顯示，古德在與沈宗濂的談話中，對他的幹練印象深刻，認爲他的態度坦率，身段柔軟。晚近學者認爲，英印政府高級官員對中國官員的印象普遍不佳，因此古德稱讚沈宗濂的情況，可謂十分罕見。不過古德也暗示沈的到來，或將對英國在西藏的利益極爲不利。[37]

沈宗濂在印度停留期間，國府外交部曾多次針對沈宗濂第二批隨行人員的過境簽證問題，與英國駐華使館交涉，但是英國和西藏政府相同，均反對中國在西藏有一強大辦事處，並懷疑一旦讓這些中國官員入藏，即很難再將他們請走。同時英國政府曾承諾西藏當局在外交上支持其獨立自主，印度也希望與西藏保持友好的關係，因此仍拒發過境簽證。[38]在此情況下，辦事處第二批工作

[35]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and India, 1914-1950*, p. 328.

[36] 〈沈宗濂關於與古德交談西藏問題情況致吳忠信函（1844 年 7 月 8 日）〉，收入《史料彙編》，冊 7，頁 243-244。

[37]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and India, 1914-1950*, p. 329.古德在他退休後所出版的回憶錄中，也對沈宗濂頗有好評，稱他爲「一位擁有寬廣視野的愛國者」(a patriot with wide views)。參閱 B. J. Gould, *The Jewel in the Lotus: Recollections of an Indian Political*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7), p. 241.

[38] Melvyn C. Goldstie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528；張永攀，《英帝國與中國西

人員的入藏計畫只能取消。不過沈宗濂雖然受此挫折，他改善漢藏關係的企圖心似乎依然強烈。

沈宗濂於 8 月 8 日抵達拉薩，西藏官員及軍士 200 名列隊歡迎，駐藏的英國、尼泊爾、不丹官員也各派員歡迎。[39]他一上任，即由辦事處在藏多年的藏文秘書李國霖陪同，逐日分別拜訪了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員，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噶丹寺）和上、下密院的僧官，大小活佛等，贈送他們禮物，有些並個別邀宴。此外，並定期對三大寺院和兩密院的僧眾佈施。沈身手確實不凡，頗令拉薩上層人士刮目相看，漢藏關係頗有改善。[40]

不久，又適逢雙十國慶日，沈邀請戲班演出京劇 3 天，並擺開了隆重的筵席，除招待西藏各界人士外，連在拉薩的錫金行政專員古德、英印政府駐拉薩代表西列夫(George Sheriff)、尼泊爾王國駐拉薩代表等，也在受邀之列。以上兩次活動，雖然所費不貲，但是營造了浩大的聲勢。尤其是佈施，前後藏四大寺及上、下密院喇嘛 28,300 人，孔慶宗時代每人佈施藏銀 2.5 兩，另施茶飲；至沈宗濂任處長時期，則以藏銀匯價高漲，增爲每喇嘛佈施藏銀 2 兩、茶飲費 1 兩，共 3 兩。[41]沈除了以辦事處的經費佈施，也大力鼓吹在藏的內地商人佈施，使得沒有佈施習慣的英國人相形見絀。根據英國駐拉薩人員的報告，即有藏僧表示，「只有英國人沒有做任何的佈施。」[42]

沈宗濂到任後的第二年，漢藏關係更加融洽。1945 年 8 月 14 日，電台傳出了中國抗戰勝利的消息，辦事處頓時鞭炮齊發，屋頂升起了國旗，四周則滿綴各色彩旗和萬國旗。留居拉薩的漢回同胞約四百餘人，奔相走告，自動聚集於辦事處大院，歡呼祝賀，夜間並舉行火炬遊行，環繞大昭寺一周，直至深夜

藏(1937-1947)》，頁 141-143。

39 《大公報》（重慶），1944 年 8 月 13 日。

40 〈沈宗濂上電委員長報告八日到拉薩後之活動及藏情（1944 年 8 月 29 日）〉，收入《檔案匯編》，冊 12，頁 250；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頁 145。

41 〈沈宗濂呈吳忠信報告入藏員工安家治裝各費及旅途必須費用轉請撥付(1944 年 2 月 19 日)〉，收入《檔案選編》，冊 13，頁 378-382。

42 Melvyn C. Goldstie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p. 530-531.

才解散。次日，沈宗濂舉辦慶祝宴會，西藏僧俗各界領袖無不前來參加，駐拉薩的英印、尼泊爾代表，也率員趕來參加祝賀。在一片歡慶的氣氛中，中國的聲望大振。[43]

雖然如此，以上各項活動所產生的影響，主要仍侷限於拉薩一地的漢、回同胞，對於藏人的影響十分有限。根據英政府駐拉薩官員的報告，8 月 14 日拉薩漢人舉行的慶祝活動由於過分喧嘩，甚至激起一些藏人的反感。當天藏方外交局長即召見沈宗濂，要求沈立即撤下所有的中國旗幟、海報和元首照片。至沈宗濂舉行慶祝宴會當天，拉薩前一日全市漫天飛揚的旗幟均已消失，僅剩懸掛在駐藏辦事處屋頂的一幅中華民國國旗。[44]

四

由於沈宗濂抵拉薩後，積極加強漢藏關係，在西藏所造成的影響頗大，使得在印度的英國人產生了疑慮。英印駐錫金的政治專員古德即建議英印政府派遣使團赴西藏，反制中國在藏的宣傳活動，並強化印藏之間的關係。他還建議印度接受一位西藏的代表常駐英印，並鼓勵西藏當局派遣一位特使，攜帶禮物赴美拜訪羅斯福總統，以增加西藏在國際上的能見度。英印政府接受了古德的建議，將建議轉呈英政府，但卻未獲倫敦方面的支持。英外務部反對加強西藏與美國及英印的外交關係，並命令古德不得對西藏當局作出過於強烈的承諾，因爲英國不願在軍事上保護西藏而和中國對抗，也不會直接支持藏人的獨立願望。[45]古德 1944 年 8 月的拉薩行，即是在此種政治氛圍下展開。

古德在拉薩期間的活動，國府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陳質平曾對外交部作過以下的報告：

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沈處長宗濂於 8 月 8 日抵拉薩，錫金政治顧

43 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頁 145。
44 Hsiao-ting Lin,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p. 170.
45 Melvyn C. Goldstie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p. 406-407.

問古德則於 8 月 31 日到達。此次我政府改派沈處長駐藏，謀調整漢藏關係，至為英方所疑慮，除指使藏政府限制駐藏辦事處人員入藏外，復由古德入藏活動。渠此去攜有大批禮物分贈藏方政要，並有煽動西藏獨立及要求在鄰近不丹之門打（即門達旺）地方駐軍之說。古德駐錫金二十餘載，為英人心目中之西藏通，去年已屆退休之年，特延長任期。此人思想陳腐，言行不能與時代適合。英印政府對藏因有其預定政策，但一切挑撥阻攔之事，皆其從中作祟與策劃。沈處長入藏，攜有我政府頒贈達賴等禮物暨在辦事處組設醫院。而古德亦賚厚禮前往。英方在拉薩之施診所原極簡陋，近亦大加改良，配以最新設備。種種布置無不與我方針鋒相對，漢藏感情好轉，英方活動亦愈積極，頗為藏務前途之隱憂。[46]

英國檔案資料所披露古德在拉薩的活動，則不僅止於此。英方的資料顯示，古德除了向西藏政府高層解釋英印當局決心增強其在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以南地區的統治之外，並提出一系列財政和外交援助方案，其中包括英屬印度政府向西藏政府及各寺院提供財政上的援助，以補償日後在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將失去的稅收，以增強西藏當局的實力，用以對抗國民政府在中國西南地區已逐漸增強的影響力。[47]

英國政府雖然主張西藏維持現狀，古德仍在西藏鼓吹西藏獨立。他對西藏當局表示，沈宗濂試圖將西藏變爲中國的一個行省，而依國際慣例，凡一國具有二十五年自主歷史，即具備獨立的資格。西藏已自主近三十年，自然可以成爲獨立國家。在他的授意之下，西藏當局致函英印政府，表明期盼英國支持西藏獨立的願望。然而英國外交部方面則以中國當前爲英國盟友，拒絕給西藏任何獨立的承諾。英印政府乃命令古德轉告西藏當局，英印政府僅能利用外交手

46 陳謙平，《抗戰前後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頁 187。

47 Sir B. Gould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November 1, 1944; Government of India to India Office, November 15, 1944, OIOC, L/P&S/12/4217. 轉引自林孝庭，〈二戰時期中英關係再探討：以南亞問題爲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頁 53。

段協助西藏維持其自治，但無法作出給予軍事支持的保證。[48]此項結果對於藏獨派無異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中、英兩國在二次大戰期間雖爲同盟國，但是兩國在西藏，卻爲了爭取西藏當局的友誼而相互競爭。1945 年，當英國駐拉薩的一位電報人員福特(Robert W. Ford)抵達拉薩時，即爲當地英國人和中國人之間的互不信任和敵意所震驚。他幾乎不敢相信英國人和中國人在拉薩居然一直處於冷戰的狀態。[49]

由於中、英兩國在西藏的競爭日益激烈，使得雙方逐漸採用最直接的「金錢外交」方式。英國方面，自古德以後，直接對重要人物送錢逐漸成爲英國駐藏人員影響藏人的重要手段；至 1940 年代，英駐拉薩官員開始有定期的詳細捐贈賬目。至於中國方面，自 1934 年黃慕松入藏後，逐漸重視佈施。[50]1943 年，國府對拉薩各大寺佈施的金錢，即達印幣 39,900 盾。[51]1945 年，捐修西藏寺院及贈送高僧費，預算更增爲印幣 50,000 盾。[52]有些學者認爲，國府在藏捐贈的金額較英人爲多，1930 與 1940 年代中、英兩國對西藏個人的捐贈均已逾越傳統的道德界線(ethical limits)。由於均非正式的外援，獲利者均爲個人，西藏政府依然缺乏經費。[53]不過就國民政府而言，對西藏寺院佈施爲歷代慣例，並無不妥之處；相反地，英國長期對藏方進行武器販售，[54]形同對中國主權的挑戰。

英國人在西藏從事「金錢外交」的手筆，雖比不上中國，但是他們後來能

---

48 詳見馮明珠，〈國民政府外交部對英印侵入康藏境域之回應(1943-1947)〉，收入馮明珠編，《文獻與史學——恭賀陳捷先教授七十嵩壽論文集》（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頁 253-259；陳謙平，《抗戰前後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頁 188-189。

49 Robert Ford, *Capture in Tibet* (London: Harrap, 1957), p. 215.

50 Alex McKay, *Tibet and British Raj*, pp. 155-156.

51 〈蒙藏會電沈宗濂請查覆三十二年度經費及拉薩三大寺佈施經費等五項決算數字（1944 年 2 月 7 日）〉，收入《檔案選編》，冊 13，頁 327。

52 參閱〈沈宗濂呈羅良鑑擬具三十四年度臨時費詳細之費計畫請鑒核備案（附計畫）（1945 年 8 月 12 日）〉，收入《檔案選編》，冊 13，頁 428-429。

53 Alex McKay, *Tibet and British Raj*, pp. 155-157.

54 徐百永，〈試論民國時期英國對中國西藏的武器供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7 年 3 月，頁 72-81。

夠提供一些中國人和西藏人所缺乏的物資，如煤油(kerosene)和糖，並給予經由印度進口貨物的免稅優待，可讓那些仰賴中、印進口貨的西藏貴族省下不少的錢。[55]

五

根據蒙藏委員會 1945 年 7 月向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一次大會所作工作報告以及其他史料，駐藏辦事處的工作成果，包括以下各項：

1. 政治方面，自蒙藏委員會派沈宗濂接替駐藏辦事處長任命發表後，西藏當局即來電表示歡迎，中央與西藏關係漸趨好轉。沈抵藏，藏當局隆重招待，立即對該處恢復一度停止的正常供應。藏政府新設的外事局，原爲抵制該處接洽公務之用，現中央與西藏日常事務，仍由沈與攝政及噶廈等直接商洽，不再經由外事局；1944 年國慶日，拉薩官民曾經發起一縣一機運動，共捐獻飛機 25 架，價值 500 萬元。[56]

2. 教育方面，國府於拉薩設有拉薩小學，由於師資與經費不足，僅能勉強維持，許多漢、回子弟因爲失望而改入藏文學校，至 1945 年底時，實際在學人數僅有 50-60 名。1946 年初，經由沈宗濂的介紹，獲得教育部邊疆教育司的鉅額經費補助，師資和設備均大有提升，至 1946 年秋時，學生人數增爲 206 人。[57]

3. 衛生方面，駐藏辦事處附設有民眾診療所，爲拉薩市民診治疾病。沈宗濂入藏時，更帶有醫官及護士同行，並在印度購辦藥品及器材，以資充實。每日就診民眾增多，約達五十名，與英印駐藏代表處醫療所的情況大致相同。[58]

4. 司法方面，蒙藏會與司法行政部會商，制訂駐藏辦事處兼理司法案件

---

55 Alex McKay, *Tibet and British Raj*, p. 157.

56 〈蒙藏委員會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一次大會所作工作報告〉，收入《史料彙編》，冊 7，頁 273。

57 常希武，〈國民黨在拉薩辦學簡介(1939-1949)〉，收入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第 5 輯，頁 85-92；徐百永、薩仁娜，〈國民政府時期的國立拉薩小學及其創辦之意義〉，《西藏研究》，2008 年第 1 期，頁 1-9。

58 陳錫璋，〈西藏從政紀略〉，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 79 輯，頁 122。

辦法，以解決藏、回、漢人民訴訟糾紛，奉行政院核准，轉立法院審議。

5. 宗教方面，自達札掌權後，西藏當局對中央所核定的班禪轉世辦法，兩年避不答覆，至 1945 年始來電表示願照中央指示，依從舊例辦理。三大寺中的色拉寺，自 1912 年與駐軍衝突後，素以反對國府著稱，至沈宗濂駐藏後也向中央貢獻法物，表示擁護。[59]

沈宗濂迅速贏得了拉薩僧俗各界菁英，包括那些對中國素無好感者的尊敬。他儘量小心，不介入西藏內政，以避免衝突，例如將有關漢回混血藏人的司法案件，交由藏方處理。[60]以往國府派駐西藏的官員，常喜歡對藏人提滿清的舊事，以為藏人喜歡滿清的統治，結果反而引起藏人的反感。[61]沈宗濂則常將清代對藏的專橫粗暴政策與民國時期作比較，他對藏人表示，當時不僅是藏人受滿清政府壓迫，漢人也是如此。對於蔣介石《中國之命運》(1943)一書中藏族為黃帝後代的說法，[62]沈則避重就輕，僅強調如今民國成立，五族共和，一律平等，西藏和中國的友誼應可恢復。康藏邊界問題之所以產生，全是由於少數官員的無知所致。只要藏人與中央政府談，一切問題均容易解決。[63]

沈宗濂在西藏除了推動一般增進漢藏關係的措施，也進行藏情蒐集的工作。國民政府時期，在西藏從事情報蒐集工作的機構，除了駐藏辦事處外，尚包括軍統局、軍令部、國民黨組織部、三青團等。[64]一般說來，這些機構對於漢、回族民眾的情報蒐集較為成功，對於英人在藏活動，則掌握不足。[65]例如，對英藏間軍火貿易的情況，所能掌握的資訊即十分有限。[66]更有進者，這些駐

59 〈蒙藏委員會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一次大會所作工作報告〉，收入《史料彙編》，冊 7，頁 273-275。

60 Melvyn C. Goldstie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530.

61 李有義，〈西藏問題之分析〉，《邊政公論》，卷 7 期 3（1948 年 9 月），頁 1。

62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5），頁 7。

63 H. E.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66.

64 〈孔慶宗成吳忠信編報該處卅二年度行政計畫（1942 年 12 月 26 日）〉，收入《檔案選編》，冊 5，頁 564；常希武，〈國民黨特工人員在西藏〉，收入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第 3 輯，頁 45-85。

65 陳錫璋，〈西藏從政紀略〉，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 79 輯，頁 125-128。

66 黎裕權，〈駐藏辦事處的設置、功能與影響——兼論國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台北：中國文化

藏的情報人員彼此之間，互不往來，各行其是。沈宗濂初至拉薩時，原想援引駐藏辦事處組織法，對各特務機構駐藏人員施行指揮及監督之權，但是受到大家一致的抵制，沈也無可奈何。[67]

沈宗濂主持駐藏辦事處時期，所從事的藏情蒐集工作主要包括偵查日本利用滿蒙喇嘛在西藏的活動、英人在藏活動，以及調查西藏各地民情。其中以最後一項工作較具成效，所調查的範圍包括政治、軍事、文化、宗教，以至地方風土民情，先後完成〈昌都系列報告〉、〈塞地亞至察隅一路情況〉、〈三十九族內向情況報告〉等，甚至沈宗濂本人，也和其秘書柳陞祺合作編纂一份有關藏情的報告書，名為〈現時之西藏〉。[68]

值得注意的是，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從事藏情蒐集工作所獲成果，除分送各相關單位參考外，甚至更進一步將之改寫出版於中外的報章雜誌，以發揮其影響力。在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中，以柳陞祺對藏情研究用力最勤，在駐藏期間曾撰寫三篇關於中、英、西藏關係的英文評論及一篇關於拉薩熱振事件的中文報導，完成後均刊登於上海的報刊。[69]他和沈宗濂合作撰寫的〈現時之西藏〉報告，經過不斷修訂，最後於 1952 年以 *Tibet and the Tibetans* 為名，由美國史丹佛大學出版社出版。[70]至於柳本人，1949 年以後也成為著名的「西藏通」。[71]

礙於交通及通訊的不便，近代中國對西藏的瞭解極少，不僅民間如此，即使政府機構也不例外。一位駐藏辦事處人員即發現，直至 1948 年，國民政府函送西藏的公文，信封封面所寫寄交單位，有寄交「西藏省政府」者，有寄交

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35。

67 陳錫璋，〈西藏從政紀略〉，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 79 輯，頁 128。

68 黎裕權，〈駐藏辦事處的設置、功能與影響——兼論國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58。

69 柳陞祺，〈我學習藏族史的經過〉，《中國西藏》，2002 年第 3 期，頁 48；柳陞祺，〈熱振事件見聞記〉，《中國藏學》，1996 年第 4 期，頁 84-100。

70 Tsung-lien Shen and Shen-chi Liu, *Tibet and the Tibet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本書中譯本，2006 年於北京出版。參閱沈宗濂、柳陞祺著，柳曉青譯，《西藏與西藏人》（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71 A. Tom Grunfeld, "Developments in Tibetan Studies in China Today,"*The China Quarterly* 115 (September 1988), p. 462.

「西藏市參議會」者，即使是專司邊務的教育部邊疆教育司，也有將寄送後藏一小學的公文寄至綏遠者。[72]在此種不利的環境下，駐藏辦事處在沈宗濂的領導下，業務推動得以較前任處長孔慶宗時期順利，漢藏關係有所好轉，已非易事，但是他並不以此自滿，更想在西藏問題上有所突破。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他草擬了一份建議書，直接以密電方式發往重慶的侍從室轉呈蔣介石。

沈宗濂在電文中大膽地提出了兩點建議：第一，爲加強和西藏的聯繫，使之不傾向於英印，首要的工作應爲迅速修築康藏公路。而要進行此項重大的工程，必先消除劉文輝割據西康的局面，並徹底地改組四川省政府，將西康併入四川。派中央大員（如吳忠信）率一支中央軍（建議可使用胡宗南的部份兵力），坐鎮成都、西昌、康定一帶，再借用該部隊力量加速修通康藏公路。第二，利用蔣介石訪印的影響，在聯合國支持印度獨立。同時由國民黨中央派員和印度國大黨會談，訂定君子協定，承認西藏爲中國領土的一部份。[73]蔣介石閱畢後，將電文交給陳布雷，要陳會同宋子文、戴季陶、陳果夫、張群等仔細研究。後來宋子文赴倫敦參加四國外交會議時，曾探詢英國對西藏問題的態度，而英國僅表示其目前所面對的主要問題爲印度獨立問題，西藏問題已無暇兼顧。[74]

事實上，當時已無暇兼顧西藏問題的反而是蔣介石。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一面依靠美國調停國共內戰，一面計劃重新剿共，東北、新疆、內蒙問題也日益突出，如何還能兼顧西藏？加上劉文輝割據西康的局面也不易改變，[75]因此蔣只能交代陳布雷覆電沈宗濂，表示目前國內局勢複雜，西藏問題只能維持現狀，不宜多事更張，只能「以無事爲大事，以無功爲大功」。沈接此覆電，知事已不可爲，乃萌生退意。[76]

72 李有義，〈西藏問題之分析〉，《邊政公論》，卷 7 期 3，頁 4。
73 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頁 746。
74 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頁 746。
75 1944 年冬，蔣介石曾試圖安排楊森和潘文華，以武力解決劉文輝。楊聽命積極準備，潘則不從，並對蔣表示，中央如掌握劉通敵叛國罪證，應公諸國人裁判，不必興師動眾，更不宜加以襲取。雖經蔣、楊多次去電催問，潘均拖延不理，最後蔣只好作罷。參閱楊續雲，〈潘文華生平及起義經過〉，《成都文史資料》，1988 年第 4 輯（總第 21 輯），頁 200-201。
76 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頁 147。

六

此時，西藏當局爲了推動西藏獨立，組織了一個「慰問同盟國代表團」，赴中、英、美三國進行活動。代表團的團長爲札薩喇嘛絨伯倫・土登桑培，副團長爲札薩凱墨・索朗旺堆，其他成員包括凱墨・次旺頓珠、強俄巴・多吉歐珠與一名翻譯員。而南京的國民政府也決定於 1945 年召開國民大會，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通知西藏當局派代表出席，並表示此次西藏代表前往南京出席國民大會，可以提出各種要求，政府將盡力解決。西藏當局認爲，既然國府有此誠意，或許有機可乘，可以提升西藏地位，於是決定在慰問同盟國代表團的基礎上再增加若干人，作爲同時出席國民大會的代表團。新增加的成員包括達賴駐南京辦事處處長曾淳・土丹參列、新任處長堪窮・土丹桑布、曾淳・土丹次旦、強巴阿旺與一位翻譯員。[77]計劃先至印度，向英美政府表示慰問，再赴南京向國民政府致敬，並參加國民大會。

爲了出席國民大會，西藏當局特別召開了全藏會議，擬定了一份提交大會的「西藏全體僧俗民眾會議報告書」，並蓋有噶廈和三大寺的印章。報告書的內容主要包括：中國與西藏的關係一直是施主與「福田」（受施者）的關係，盼能繼續維持；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日後也將獨立運作；過去中國以武力方式奪取一些在語言上和文化上明顯屬於西藏的領土，如青海、西康等地，違反國際規定，應交還西藏；西藏一直是獨立的國家，自己管理自身的內政、外交、軍事事務。十四世達賴喇嘛有權選任各寺院的各級轉世活佛、任免各級官員、對傳統進行改革，中國或其他國家均不應介入；中國人進入西藏前，應經由中國政府向西藏政府申請入境簽證；當今世界上有許多大國已取得了空前的財富和權力，但是只有一個國家致力於世界人類的幸福，那即是實施政教合一制度的西藏，因此西藏對於世界的和平與福祉至爲重要；如有任何外國政府以軍事力量入侵西藏，西藏將要求中國政府本著兩國之間歷史上的檀越關係給予

77 〈陳錫璋呈羅良鑒報送國民大會西藏代表處名單（1946 年 1 月 21 日）〉，收入《檔案選編》，冊 6，頁 308。

支持。[78]藏方當局的計畫是，如果蔣介石在國民大會開會前，能對此報告書迅速作出回應，西藏代表團即離開中國；如果不能，代表團即以觀察員而非正式代表的身分參加會議。

此時英國駐錫金政治專員古德已退休卸任，由霍普金森(A. J. Hopkinson)接任，他從中國方面得知西藏的慰問同盟國代表團計劃參加中國的國民大會後，即於 1945 年 12 月聯繫西藏當局，指出此種行動將與西姆拉協定的第 4 條發生牴觸，並會對西藏的自主造成傷害。藏方當局則重申代表團並無此種計畫。[79]爲了保守秘密不讓英人事前知道內容，報告書不由代表團隨身攜帶，而是由西藏當局派人經由西康至重慶直接交給代表團。[80]計劃由代表團遞交國民政府後，再通過廣泛的私人活動，力爭批准。[81]

1946 年初，代表團啓程前夕，首席噶倫喇嘛指示代表團團員，對於此次出訪，「對外只能說是去慰問漢、英、美同盟國的勝利，對參加國民代表大會和全藏會議報告書等事項，一定要嚴守機密。每個團員一定要服從團長的指揮，不得擅自行動。」[82]根據蔣介石所獲得的情報顯示，西藏攝政達札於代表團啓程前曾召集要員集會，決議要求出席國民大會代表，此行應以保持現有特殊地位爲原則，不可任意發言，引起國府對藏用武的決心；如國府仍採懷柔政策，則要求獨立，最低限度應要求完全自治；如獲准獨立，中、藏地界的劃分，需依西姆拉會議的條款。[83]

---

78 Melvyn C. Goldstie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p. 538-543.

79 Melvyn C. Goldstie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p. 544.

80 〈沈宗濂爲報陪同西藏代表前來參加國民大會途經印度等情事致羅良鑒函（1946 年 2 月 8 日）〉，收入《史料彙編》，冊 7，頁 299-300。

81 強俄巴．多吉歐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團慰問同盟國和出席南京國民代表大會」內幕〉，收入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第 2 輯，頁 1-3；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and India, 1914-1950*, p. 459. 達賴和攝政達札致美國總統杜魯門函件的內容，可參閱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p. 592-593.

82 強俄巴．多吉歐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團慰問同盟國和出席南京國民代表大會」內幕〉，收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頁 3。

83 〈蔣介石對西藏出席國大代表將在會上提出提案內容致蒙藏委員會代電（1946 年 1 月 29 日）〉，

1946 年元月底，代表團正式成員八人騎乘出發，經過了三星期，抵達錫金首府，受到錫金國王和英國駐錫金政治專員霍普金森的熱烈歡迎，在正式接見後並舉行豐盛的宴會款待。會後，霍普金森親自陪同代表團成員，經加爾各答抵達新德里。在新德里停留的兩個星期中，代表團曾獲英駐印度總督維瓦(Lord Wavell)暨夫人的接見。代表團向他們遞交了達賴和攝政王達札的信件，並致贈了禮物，包括繡有佛像的畫軸、銀器和西藏地毯等。交談結束後，總督暨夫人在宮廷花園中與代表團成員合影留念並設宴款待，如此即完成了對英國政府表示慰問的活動。

至於對美國政府表示慰問團的儀式，則是在新德里的美國駐印大使館內舉行。代表團拜會了美國駐印臨時代辦(Chargé d'Affaires ad interim)麥克芮爾(George R. Merrell)，遞交了達賴和攝政王達札寫給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的信及達賴的照片，雙方並進行晤談。儀式完畢後，大使館設宴招待，並放映電影。[84]霍普金森在知道代表團赴南京慰問國民政府一事後，並未明顯表態，但是對他們參加國民政府召開的國民大會，則明顯地表示不滿。[85]霍普金森於是想盡辦法拖延，先是建議代表團由海路前往中國；又利用代表團成員因氣候溼熱生了痱子，故意說是患了傳染病，必須儘速治療。爲了擺脫霍普金森的干擾，代表團乃向國府駐藏辦事處求助。辦事處人員於是協助代表團成員搬往國府駐加爾各答的領事館。領館人員對西藏當局派遣代表團赴南京參加國民大會顯現出高度熱情，爲代表團赴內地作好了一切安排，並表示歡迎代表團成員的親友、傭人陪同前往。於是代表團成員增加了一位副團長的夫人、一位英語翻譯和一位秘書。[86]

收入《史料彙編》，冊 7，頁 298-299。

84 強俄巴・多吉歐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團慰問同盟國和出席南京國民代表大會」內幕〉，收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頁 3-4。

85 強俄巴・多吉歐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團慰問同盟國和出席南京國民代表大會」內幕〉，收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頁 4。

86 強俄巴・多吉歐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團慰問同盟國和出席南京國民代表大會」內幕〉，收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頁 4。

辦事處方面，則早由沈宗濂說服達賴的胞兄嘉洛頓珠與達賴的姊夫平措札西前往南京訪問，並先期秘密赴印。沈佈置妥當後，發電報告中央，說明西藏決定派兩名大員前往中央慶賀勝利，並參加國大會議。由於事關重要，應由他陪同照料，旋得覆電批准。1946 年 4 月 4 日，代表團成員及隨行人員和達賴家屬等一行近三十人，在沈宗濂的陪同下，搭機經昆明前往南京。消息傳到拉薩，引起親英之當權派達札的震驚，英人則認為是沈宗濂的政治勝利。[87]

4 月 7 日，一行人抵達南京，受到蒙藏委員會的歡迎接待。當時國民政府正忙於由重慶遷往南京，蔣介石於一個月後抵達南京，國民政府舉行抗戰勝利慶賀儀式。儀式結束後，蔣介石夫婦設宴款待代表團成員與嘉洛頓珠、平措札西，並合影留念。[88]當慰問同盟國代表團的活動全部結束後，西藏代表即將報告書（業經西藏駐京辦事處譯為中文）送交國民政府（先是送外交部，外交部以西藏非外國堅持拒收，西藏代表只得轉往蒙藏委員會遞送），並盼能於國大會議開會前獲得回應。蒙藏委員會則表示茲事體大，需仔細討論，建議他們參加國民大會，並於會場表明他們的意見。[89]

七

國民代表大會於 1946 年 11 月 15 日開幕，由於此次大會的主要任務是制定憲法，因此又被稱為「制憲國大」。參加的藏方當局代表包括僧俗官員 5 人，達賴南京辦事處新任官員 3 人和原辦事處官員 2 人，共 10 人；班禪堪廳的代表 6 人，甘南、青海、西康藏族代表各 1 人。[90]

代表團由於未接到國民政府對於報告書的回應，報到時乃依原藏方指示不

---

87 陳錫璋，〈西藏從政紀略〉，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 79 輯，頁 131。

88 強俄巴．多吉歐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團慰問同盟國和出席南京國民代表大會」內幕〉，收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頁 6。

89 Melvyn C. Goldstie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554.

90 強俄巴．多吉歐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團慰問同盟國和出席南京國民代表大會」內幕〉，收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頁 7。

領取代表證，宣稱只是奉達賴之命前來參觀，並非正式代表。中央要熟悉邊疆事務的白崇禧處理此事。白遂邀請代表們至其寓所，發表了以下的談話：

> 你們不肯接受代表證，說是來參觀的，這不好。西藏是中華民國領土之一，現在我們抗戰勝利後，全國各地都有代表來參加，西藏不能例外。我們是五族共和，你們有份，為什麼不參加？你們雖是邊疆地區，也應參加。你們要知道過去清末民初西藏和中央政府搞得不愉快，這是受英國人的挑撥，對雙方都不利；民初尹昌衡曾用過兵，失敗過，那時補給困難，而且息事寧人，沒用全力，採懷柔政策，現在時代不同了，二十七年達賴〔按：係指藏方當局〕不給中央設的辦事處升旗，我奉命到青海玉樹開機場，你們便接受了，轟炸機去拉薩一轟完了，中央不得已時會採這種政策的。趕快打電報回去，改過來，不可自己鬧家務，如果要求以參觀代表身分參觀，大會不會接受，大會〔會〕場進不去，你們要吃虧的，不要受英國人教唆，好好與中央合作，對你們的開發和教育都有好處，無害處，為什麼要鬧分離呢？快打電報回去，這是愛護你們。[91]

西藏代表聽了白崇禧的報告後，拍電報回藏請示，獲藏方當局回電同意他們以國大代表身分參加。代表團團長圖丹桑波並當選爲主席團成員，土丹參列等當選爲憲法草案審查委員會委員。[92]

整個會議期間，西藏代表均遵守西藏當局事前的指示。爲請示工作，代表們曾兩度拍發電報給藏方當局，獲電示：在會場上不要鼓掌，議案進行表決時，不要舉手；在決議文中，力爭不寫有關西藏事宜。[93]在分組討論中，西藏和內

---

91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訪問兼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下冊，頁 851-852。

92 國民大會秘書處編，《國民大會實錄》（南京：編者印行，1946），頁 368、415。

93 強俄巴·多吉歐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團慰問同盟國和出席南京國民代表大會」內幕〉，收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頁 7-8；葉錦鴻，〈從國府檔案看西藏歸屬問題〉，收入黃翔瑜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8），頁 130。

蒙被劃爲一個小組，由白崇禧主持。對憲法逐條進行討論時，有一條是關於西藏、內蒙實行自治問題，由於西藏當局事前已有指示，西藏代表乃採沉默態度。散會後，代表們經過討論，決定直接向白崇禧表達「憲法中不能寫進西藏問題」的意見，白重複「五族共和」的說法，答覆說：「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大國，就像一個大公司，有漢、滿、蒙、回、藏各族人民，大家都是這個大公司的主人。我們是五族共和，這樣寫沒有關係。」西藏代表對此再沒有提出異議。[94]會議結束後，西藏代表原以爲會有簽字儀式，乃離會赴上海旅遊七日，藉以迴避簽字手續，未料最後並未有簽字一項程序。

大會最後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明確規定了西藏的地位，規定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等機構中，均需有西藏代表參加。第 168 條規定：「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地位，應予以合法之保障，並於其地方自治事業，特別予以扶持。」[95]會議結束後，蔣介石夫婦特別宴請全體西藏代表、達賴的親屬及隨員共 22 人。蒙藏委員會並安排西藏地方代表至各地參觀，翌年五月才離京經由海道返回西藏。

至於西藏全體僧俗民眾會議的報告書，由蒙藏委員會轉呈國民政府，事隔半年，未見下文，經西藏代表數度詢問，獲覆「政府已成立了以蒙藏委員會爲首的小組，專門調查解決此事。」代表團的兩位團員曾派人在南京購買相當數量的金條、金鐲，試圖通過行賄的手段，促成報告書能夠獲得批准。[96]最後，終於由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羅良鑒奉蔣介石命函覆，表示報告書中要求國府歸還原西藏領土部份，事關重大，應請西藏政府派高級官員赴京會商。[97]代表團也

94 強俄巴‧多吉歐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團慰問同盟國和出席南京國民代表大會」內幕〉，收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頁 7；國民大會秘書處編，《國民大會實錄》，頁 460-461；阮毅成，《制憲日記》（台北：商務印書館，1970），頁 66。

95 《中華民國憲法》（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93），第 168 條。

96 強俄巴‧多吉歐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團慰問同盟國和出席南京國民代表大會」內幕〉，收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頁 9。

97 〈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一九四七年度重要工作報告（藏事部分）〉，收入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民國藏事工作報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頁 14；〈噶廈爲新選總統證書西藏代表不必簽字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48 年 5 月 17 日）〉，收入《史料彙編》，冊 7，頁 402。

認爲茲事體大，在南京談不可能會有什麼結果，日後如能在拉薩協商，客觀條件有利於西藏政府，或能有所進展。經代表團向藏方當局發電報請示，獲覆電同意以後再議。[98]1947 年 4 月，蒙藏委員會改組，由許世英出任主任委員，許上任後查閱檔案，發現報告書中有「西藏乃佛法勝地，自治自主之國」字句，如未經駁斥，即等於承認其爲一「國」。[99]經請示蔣介石後，獲蔣同意予以駁覆。[100]國民大會事件至此才眞正宣告落幕。

國民大會事件，對西藏當局來說，自是一大挫敗，原有的政治地位未獲提升，領土問題未獲解決，也未能擺脫國府憲法的約束，參加國大會議及制憲期間被媒體大幅報導，更成爲國府在 1950 年聯合國大會討論西藏問題時有利的宣傳資料。[101]對於國民政府來說，成功地說服西藏當局派出代表出席國大並參加制憲，強化了國府政權的合法性，並將西藏納入憲法的架構下，自是打了一場勝仗。對於沈宗濂來說，此次事件則毫無疑問地讓他再度揚眉吐氣。

沈宗濂在南京期間，曾陪同西藏代表及嘉洛頓珠晉謁蔣介石，並獲蔣的嘉勉。在此之前，沈並拜訪了戴季陶和陳布雷，詳談在藏一年多的情況以及他對西藏問題的看法。沈表示，既然目前藏事不能有所作爲，自己又患有心臟病，不宜久住高寒地帶，故請陳布雷代爲表達辭意。蔣同意沈不妨暫時休息，以後將另有任用。1947 年初，上海市長吳國楨邀沈任市府秘書長，此項任命自然是出自蔣的授意。

某日，一些原服務於侍從室的同事聚會，沈宗濂在談到西藏時，喟然嘆道：「國力不逮，內部分裂，我們對西藏是無能爲力的了。」[102]以此作爲他西藏經驗的總結。

98 強俄巴．多吉歐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團慰問同盟國和出席南京國民代表大會」內幕〉，收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頁 9。

99 〈蒙藏委員會爲擬駁覆噶廈稱西藏爲自治自主之國意見事致國民政府呈文（1948 年 5 月 25 日）〉，收入《史料彙編》，冊 7，頁 403。

100 〈蔣介石爲西藏代表拒簽當選證書不必再與交涉對其稱「國」自屬可令行事致蒙藏委員會代電（1948 年 6 月 7 日）〉，收入《史料彙編》，冊 7，頁 405。

101 Melvyn C. Goldstie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p. 558-559。

102 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頁 149。

八

沈宗濂駐藏時期，西藏當局、攝政達札以及一般藏官對國府的態度均有好轉，其原因固然是由於抗戰勝利，中國躍於強國之林，藏人目睹印人反英浪潮澎湃，對於英人在印勢力是否能持久產生疑慮，而沈宗濂在藏期間的表現優異，[103]也是原因之一。沈宗濂及其工作團隊，一反前任處長孔慶宗的官僚心態和大漢沙文主義，對西藏問題抱持著承認現狀的務實態度，[104]加上他們的身段柔軟，因此能夠迅速獲得藏人的好感。更重要的是，沈宗濂由於出身侍從室，能獲得蔣的充分信任與支持，以致於他所掌管的駐藏辦事處，不論是編制、人員或經費，均較前任處長孔慶宗時期為寬裕，並且用人自主，遇有問題尚可直接致電侍從室，而不需層層請示。雖然如此，沈終其任內，在西藏問題上仍無法有所突破，推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項：

第一，國民政府的邊政未上軌道，對藏情認識不足。[105]國府時期邊政的最大缺點為事權不統一，蒙藏委員會雖為專司邊政的機關，但是實際上並無權力，各有關部會又無配合行動，往往各行其是，互無關聯（各單位派駐拉薩特務人員缺乏整合即為一例）。如此不僅減低行政效率，也令邊民無所適從。其次，邊政人事制度也不健全。英印的駐藏人員大多係長期任職，他們對當地情況的熟悉與工作之熟練，均使國府駐藏人員驚異，反觀國府駐藏人員則二、三年即異動一次，永遠無法產生專門人才。此外，中國內地對西藏情況的隔閡，

103 例如學者 Alastair Lamb 即認為沈宗濂及其工作團隊均極為能幹，外交手腕與英國駐拉薩代表西列夫(George Sheriff)和黎吉生(Hugh Richardson)相當。參閱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and India, 1914-1950*, p. 347.

104 沈宗濂及其同事認為，「自 1911 年以後，拉薩實際上擁有完全的獨立，它擁有自己的貨幣和海關，它擁有自己的電報局和郵政，它擁有與中國內地不同的文官系統，它甚至擁有自己的軍隊」、「憑我們滿口滿嘴的主權與宗主權，而西藏當局的行為、言論，可說只差一點就是獨立」。參閱 Tsung-lien Shen and Shen-chi Liu, *Tibet and the Tibetans*, p. 62；柳陞祺，〈熱振事件見聞記〉，《中國藏學》，1996 年第 4 期，頁 94。

105 1948 年，蒙藏委員會藏籍的副委員長喜饒嘉措即曾表示，「西藏問題不能得到完滿解決，主要原因是中央不了解西藏內情，而自以為非常了解，便鑄成今日之局面。」參閱楊效平，〈喜饒嘉措大師生平事略〉，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第 92 輯，頁 152-153。

遠勝於任何外國。[106]如一位藏務官員戰前所著《康藏》一書，其中對藏人的描述即爲「人民素性慓悍，好勇善戰；其後受佛教之感化，迷信報應之說，相沿日久，故民族天性一變而爲純良。天性慈善，誠實不欺，恪守紀律，不尙華美。惟言行粗率，思想幼稚，素抱閉關主義，依戀故土，不喜遠遊；又無定志，每易盲從。」[107]藏政官員對藏人尙有這些刻板印象，一般社會大眾媒體出現「所有藏族俗人都患有梅毒病，而淋病更是普通的」、「（此次國民大會開會）西藏代表札薩凱墨・索朗旺堆的夫人德央在飯店進餐時，竟把掉在桌子上的點心渣用舌頭舔著吃了」之類的歧視報導，[108]也就不足爲奇了。整體而論，中國內地不分朝野上下，對藏人的印象即是愚昧無知、貪婪懶惰、閉關自守、文明落後，[109]亟待接受「文明教化的方案」("civilizing projects")，以「提升」其經濟、教育、文化水準至漢人的水平。[110]

第二，西藏堅守自主的原則。根據晚近學者的研究，自民國成立後，西藏

106 李有義，〈西藏問題之分析〉，《邊政公論》，卷 7 期 3，頁 34。

107 劉家駒，《康藏》（上海：新亞細亞月刊社，1932），頁 24。

108 強俄巴・多吉歐珠，〈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團慰問同盟國和出席南京國民代表大會」內幕〉，收入《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2 輯，頁 10。

109 晚近學界對於西方人的西藏觀研究甚多，代表性的著作包括：Peter Bishop, *The Myth of Shangri-La: Tibet, 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a Sacred Landscape* (Be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Alex McKay, *Tibet and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 Thierry Dodin and Heinz Räther, eds, *Imaging Tibet: Realities, Projections, and Fantasies*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1); Laurie Howell McMillin, *English in Tibet, Tibet in English: Self-Presentation in Tibet and the Diaspor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2001); Martin Brauen, *Dreamworld Tibet: Western Illusions*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4); Dibyesh Anand, 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Gordon T. Stewart, *Journeys to Empire: Enlightment, Imperialism, and the British Encounter with Tibet, 1774-190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有關近代中國人的西藏觀，則僅有一篇論文：Martin Slobodnik, "The Perception of Tibet in China: Between Disdain and Fascination."《輔仁歷史學報》，期 17（2006 年 11 月），頁 71-109。可惜的是，此文並未論及民國時期。

110 Stevan Harrell, "Introduction: Civilizing Projects and the Reactions to Them," in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pp. 3-36; Idem, "L'état c'est nous, or We have Met the Oppressor and He Is Us: The Predicament of Minority Cadres in the PRC," in Diana Lary, ed., *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 (Vancouver: UBC Press, 2007), p. 223.

人雖已擁有實質的獨立，但並未能建立一個國家(nation)。他們並未努力推動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也未出現公民身分(citizenship)的概念，因爲如此將會改變原有的寺院、貴族和一般民眾的關係。[111]雖然如此，西藏自民初撤除駐藏大臣及駐軍，實行完全自治後，其政府機構依第五世達賴所訂「以教領政」的制度，另由十三世達賴充實完備。至十四世達賴，因年幼不能執政，乃以攝政代行職權，其下以噶廈（行政部）爲最高政務機構，由大臣大會執行。政府統治權力甚強，只是平民多被貴族貪索奴役，加以篤信佛教，對寺院供養過多，以致人民經濟多感艱困。十三世達賴統治西藏二十餘年，其生前的對外政策及圓寂前所頒遺訓，均爲在維持西藏固有完整自主原則之下，與中、英兩國保持平衡親善，因此對於國府及英印方面均採不即不離的態度。在對國府方面，兩次歡迎派大員參加舊達賴圓寂新達賴登座典禮，並接受國府在拉薩設辦事處、電台、醫院、小學，也派有代表常駐內地，戰後更派中、下級官員 8 名爲國民大會代表。此舉應可視爲對國府最大的親善表現，也可以說是沈宗濂對藏工作的最大收穫。但是另一方面，西藏當局對於沿邊藏境依舊不許任何漢人入境，在抗戰期間所新設的外交局仍然存在，對國府所提若干有關邊地事件也多未接受。對於英印政府方面，也同樣接受其在拉薩設立辦事處、電台、醫院、學校；拉薩每遇需要武器、金錢或物資，莫不由英方售貸。但是另一方面，西藏當局對於英方所提要求許可經濟、政治上的較大權力，也均未接受，平時也不允諾英人自由入境，其態度由此可見一斑。[112]

第三，中、英雙方均堅守其國家利益，互不相讓。英國自 1913 年西姆拉會議起，直至 1947 年印度獨立前，外交政策在維持帝國現有的疆土，並不支持西藏獨立，但是由於西藏爲印度的屏藩，英盼能維持其自主地位，成爲中、俄之間的緩衝區。[113]1942 年初，美、英、蘇、中四國領銜簽署 26 國共同宣言，

[111] Gray Tuttle,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1-52.

[112] 格桑澤仁，〈藏族現狀之報告〉，收入氏著，《邊人芻言》（重慶：西藏文化促進會，1946），頁 100-101。

[113] Dibyesh Anand, "Strategic Hypocrisy: The British Imperial Scripting of Tibet's Geopolitical

中國成爲「四強」之一，開始積極介入亞洲地區事務，包括援助韓國獨立運動、扶助越南獨立運動、派遣遠征軍出征緬甸、介入英印事務等。[114]這些行動雖然展現出中國對周邊國家的責任感，但是卻引起了英印及英國的疑慮。在英印政府的眼中，戰時中國對英國在亞洲殖民統治所帶來的威脅，或許並不亞於日本軍國主義之於遠東地區及希特勒之於歐洲地區。英國政府也認爲「中國帝國主義」(Chinese imperialism)在南亞的迅速滋長，以及未來一個強大統一並具有國際地位的中國，在戰後對於英國在印度和東南亞的殖民統治，將帶來巨大的威脅和挑戰，因此在西藏與中印邊境等問題上，對中國採取反制措施。當時英國外交決策圈中，甚至普遍認爲若蔣介石希望英國允許印度獨立，則國民政府也應同意西藏脫離中國獨立。[115]中國方面，則始終堅持西藏爲其領土的一部份。1933 年內蒙德王在日本的支持下，要求自治。[116]蔣介石對此曾公開表示，對邊疆可同意其自治，並組織「五族聯邦」的國家；[117]抗戰勝利後，外蒙古獨立，蔣也只同意給予西藏「高度的自治」，須待其經濟發展後，方可同意其獨立。[118]

Ident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8:1 (February 2009), pp. 227-252.

114 王建朗，〈大國意識與大國作爲——抗戰後期的中國國際角色定位與外交努力〉，《歷史研究》，2008 年第 6 期，頁 130。

115 林孝庭，〈二戰時期中英關係再探討：以南亞問題爲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頁 47-55。

116 Sechin Jagchid, *The Last Mongol Prince: The Life and Times of Demchugdongrob, 1902-1966* (Bellingham, Washington: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9), p. 68; Justin Tighe, *Constructing Suiyuan: The Politics of Northwestern Territory and Development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eiden: Brill, 2005), p. 229; Xiaoyuan Liu, *Reins of Liberation: 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74.

117 蔣介石，〈中國邊疆問題（1934 年 3 月 7 日在南昌講）〉，收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卷 12，頁 108-109；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台北：國史館，2006），冊 25，頁 72-82；張瑞德，〈運籌帷幄：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與南昌行營的政策制定(1933-1935)〉，收入《走向近代》編輯小組編，《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台北：東華書局，2004），頁 334。

118 蔣介石說：「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懸未決的問題，我可以負責聲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時提出自治的願望，我們政府亦必將賦予高度的自治。如果他們將來在經濟條件上能夠達到獨立自主的時候，我們政府亦將如對外蒙一樣的精神扶助他們的獨立。」參閱蔣介石，〈完成民族主義維護國際和平（1945 年 8 月 24 日主持中央常會、國防最高委員會聯席會議講）〉，收入《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21，頁 172-173。

中、英雙方均堅持自身的利益，不願退讓，想要解決西藏問題自非易事。

由蔣介石派沈宗濂駐藏的例子可以看出，「特使」一如手令，[119]均為蔣介石處理國事時所常用的手段，尤其是在緊急情況下，可以避免一般行政體制或程序的束縛，產生一定的效果，不過是否能解決問題，仍須視外在環境和其他條件是否具備而定。

[119] 張瑞德，〈蔣介石的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頁 27-49。

徵引書目

一、檔案

國史館藏

1.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 1943 年 3 月 4 日致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函，〈軍令部長徐永昌彙摘各方面情報並抒調整蒙藏會駐藏辦事處意見〉，檔號：0592/4410.01-15。
2. 軍令部部長徐永昌 1943 年 2 月 22 日呈蔣介石文，〈軍令部長徐永昌彙摘各方面情報並抒調整蒙藏會駐藏辦事處意見〉，檔號：0592/4410.01-05。

二、史料

《大公報》（重慶），1944 年 8 月 13 日。

《中央日報》（重慶），1944 年 4 月 16 日。

《中華民國憲法》。台北：行政院新聞局，1993。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79、92 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1984。

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 2-5 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1985。

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學漢文文獻編輯室編，《民國藏事工作報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

沈宗濂、柳陞祺著，柳曉青譯，《西藏與西藏人》。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邢肅芝（洛桑珍珠）口述，張健飛、楊念群筆述，《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歷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阮毅成，《制憲日記》。台北：商務印書館，1970。

李有義，〈西藏問題之分析〉，《邊政公論》，卷 7 期 3，1948 年 9 月，頁 1-4。

金紹先，〈憶述國民黨元老吳忠信〉，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軍政人物編》，卷 9。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

周旋華，《財政與外交的工作回憶》。台北：作者印行，2006。

周美華編，《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冊 25。台北：國史館，2006。

柳陞祺，〈熱振事件見聞記〉，《中國藏學》，1996 年第 4 期，頁 84-100。

柳陞祺，〈我學習藏族史的經過〉，《中國西藏》，2002 年第 3 期，頁 48。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

唐　縱，《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8。

格桑澤仁，《邊人芻言》。重慶：西藏文化促進會，1946。

張令澳，《我在蔣介石侍從室的日子》。台北：周知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

張羽新、張雙志編，《民國藏事史料彙編》，冊 1、7。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國民大會秘書處編，《國民大會實錄》。南京：編者印行，1946。

陳布雷，〈陳布雷先生從政日記稿樣〉，未刊稿，國史館藏，1942 年 12 月 13 日。

楊續雲，〈潘文華生平及起義經過〉，《成都文史資料》，1988 年第 4 輯（總第 21 輯），頁 192-212。

賈廷詩、馬天綱、陳三井、陳存恭訪問兼紀錄，《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蒙藏委員會編譯室編，《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冊 3-6、13。台北：蒙藏委員會，2007。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5。

劉家駒，《康藏》。上海：新亞細亞月刊社，1932。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冊 5。北京：中華書局，1987。

濱田峰太郎，《現代支那の政治機構とその構成分子》。東京：學藝社，1936。

三、專書

呂昭義，《英帝國與中國西南邊疆(1911-1947)》。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

周偉洲編，《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

張永攀，《英帝國與中國西藏(1937-194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郭卿友，《民國藏事通鑑》。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陳謙平，《抗戰前後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喜饒尼瑪、蘇發祥，《蒙藏委員會檔案中的西藏事務》。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6。

劉國銘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鄧銳齡等著，多杰才旦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

Anand, Dibyesh. *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Bishop, Peter. *The Myth of Shangri-La: Tibet, 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a Sacred Landscape*. Be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Brauen, Martin. *Dreamworld Tibet: Western Illusions.* Bangkok: Orchid Press, 2004.

Craft, Stephen G. *V.K. Wellington Koo and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a*.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2004.

Dodin, Thierry and Heinz Räther, eds. *Imaging Tibet: Realities, Projections, and Fantasies*.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1.

Ford, Robert. *Capture in Tibet.* London: Harrap, 1957.

Goldstie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Gould, B. J. *The Jewel in the Lotus: Recollections of an Indian Political.*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7.

Jagchid, Sechin. *The Last Mongol Prince: The Life and Times of Demchugdongrob, 1902-1966.* Bellingham; Washington: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9.

Lamb, Alastair. *Tibet, China and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Hertfordshire, UK: Roxford Books, 1989.

Lin, Hs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49.* Vancouver: UBC Press, 2006.

Liu, Xiaoyuan. *Reins of Liberation: 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McKay, Alex. *Tibet and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1947*. London: Curzon Press, 1997.

McMillin, Laurie Howell. *English in Tibet, Tibet in English: Self-Presentation in Tibet and the Diaspor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Richardson, H. E.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Shen, Tsung-lien and Shen-chi Liu. *Tibet and the Tibet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Stewart, Gordon T. *Journeys to Empire: Enlightment, Imperialism, and the British Encounter with Tibet, 1774-190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Tighe, Justin. *Constructing Suiyuan: The Politics of Northwestern Territory and Development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eiden: Brill, 2005.

Tuttle, Gray.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II, *The Far East: Chin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四、論文

王建朗，〈大國意識與大國作爲——抗戰後期的中國國際角色定位與外交努力〉，《歷史研究》，2008 年第 6 期，頁 124-137。

林孝庭，〈二戰時期中英關係再探討：以南亞問題爲中心〉，《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頁 32-56。

孫子和，〈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與中央之關係(1934-1947)〉，收入氏著，《西藏研究論集》台北：商務印書館，1989。

徐百永，〈試論民國時期英國對中國西藏的武器供應〉，《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7 年第 1 期，頁 72-81。

徐百永、蘆仁娜，〈國民政府時期的國立拉薩小學及其創辦之意義〉，《西藏研究》，2008 年第 1 期，頁 1-9。

張瑞德，〈運籌帷幄：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與南昌行營的政策制定(1933-1935)〉，收入《走向近代》編輯小組編，《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台北：東華書局，2004。

張瑞德，〈蔣介石的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5 期，頁 27-49。

馮明珠，〈國民政府外交部對英印侵入康藏境域之回應(1943-1947)〉，收入馮明珠編，《文獻與史學——恭賀陳捷先教授七十嵩壽論文集》。台北：遠流出版公司，2002。

葉錦鴻，〈從國府檔案看西藏歸屬問題〉，收入黃翔瑜編，《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8

黎裕權，〈駐藏辦事處的設置、功能與影響——兼論國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Anand, Dibyesh. “Strategic Hypocrisy: The British Imperial Scripting of Tibet’s Geopolitical Identit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8:1, February 2009, pp. 227-252.

Grunfeld, A. Tom. “Developments in Tibetan Studies in China Today.” *The China Quarterly* 115, September 1988, pp. 462-466.

Harrell, Stevan. “Introduction: Civilizing Projects and the Reactions to Them.” In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Harrell, Stevan. “L’état c’est nous, or We have Met the Oppressor and He Is Us: The Predicament of Minority Cadres in the PRC.” In Diana Lary, ed., *The Chinese State at the Border*. Vancouver: UBC Press, 2007.

Slobodnik, Martin. “The Perception of Tibet in China: Between Disdain and Fascination.”《輔仁歷史學報》，期 17，2006 年 11 月，頁 71-109。

Yuan, Tung-li. “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Continental Europe, 1907-1962 (I).” *Chinese Culture* (Taipei) 5:3, March 1964, pp. 92-156.

A “Royal” Mission: Shen Zonglian in Tibet, 1943-1946

Chang Jui-te*

Abstract

In October 1943, Shen Zonglian replaced Kong Qingzong as the Director of the Mo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s Office in Tibet. Shen’s appointmen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political circles in Chongqing, the capital of wartime China, because he was directly appointed by Jiang Jieshi (Chiang Kai-shek) to take on a position that had normally been filled through nomination by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 itself.

During Shen Zonglian’s residency in Tibet, the attitudes of Tibetan authorities and monastaries toward Nationalist China became positive. There are four major reasons for this attitudinal change. First, China had become one of the “Big Four” in 1940s. Second, the Tibetan people started to doubt Britain’s capacity to dominate India after having witnessed the rising of anti-British sentiment there. Third, Shen did an excellent job during his residency in Tibet. In contrast to the bureaucratic mentality and Han chauvinism of Kong Qingzong, Shen Zonglian and his team adopted a practical and flexible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Tibetan issues; accepted the existing relations with Tibet; and quickly earned the trust of Tibetan people. Finally, Shen Zonglian used to be on the personal staff of Jiang Jieshi and had Jiang’s full trust and support, which gave Shen considerable autonomy in staffing and budgeting.

Nevertheless, Shen did not made a breakthrough in solving the major Tibetan issues due to the thre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the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under Nationalist rule was not on the right track, suffering from a poor understanding of Tibetan affairs. Second, Tibetan authorities

* Department of History,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had maintained an equal distance from China and Britain and preserved their autonomy. Third, neither China nor Britain was willing to make any compromises on questions of national interest in dealing with Tibetan issues.

Keywords: Shen Zonglian, Tibet, Jiang Jieshi, Kong Qingzong, Mongol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ommission